



Sorry

抱歉

[澳大利亚] 盖尔·琼斯 著

方军 吕静莲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I611.4/9+1

2008

抱歉

Sorry



[澳大利亚] 盖尔·琼斯 著

方军 吕静莲 译



衷心感谢澳大利亚驻沪总领事馆对本书翻译和出版的支持

*The support of the Australian Consulate General in Shanghai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is novel is gratefully acknowledged.*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抱歉/(澳) 盖尔·琼斯著;方军,吕静莲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8

(盖尔·琼斯小说精品)

ISBN 978-7-5321-3380-2

I. 抱… II. ①盖…②方…③吕…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2588 号

SORRY by GAIL JONES

Copyright:© Gail Jones 200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RCW)**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 0 0 8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沪权) 图 字 - 2 0 0 8 - 3 6 1 号

责任编辑:海力洪

封面设计:丁威静

抱 歉

(澳) 盖尔·琼斯 著 方军 吕静莲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54,000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 978-7-5321-3380-2/I · 2568 定价:21.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献给维罗妮卡·布雷迪

第一部

安提哥纳斯：……昨晚一定是你的母亲

向我出现了，梦境从来没有

那样清楚的。我看见一个人向我走来，

她的头有时侧在这一边，有时侧在那一边；

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满面愁容的人

有这样庄严的妙相……

——《冬天的故事》第三幕第三场

1

一声低语：嘶——。呼吸之最纤细的载体。

这是一个只能在低语中讲述的故事。

在种种艰难的认知方式前，有一种静默，一种羞惭，一种悲哀，一种趋于沉默的倾向。我的喉咙被它所传达的一切扭曲。我的心是一粒懒散的酸果。我想，是时间的口络令我如此，它毁损了我的嘴、我的声音和我诉说的欲望。最初，只是那个单独的情景：她的衣服，绣球花一般特别的蓝色，溅满了我父亲紫红色的血。她从地板上站起来，成为那个明晰的形象，因为淤血而变得生气勃勃——噢，多么不合时宜！我记得，我紧拽着她，我们警觉而心照不宣。对我们全副警惕的注意力来说，房子里也许有一条蛇。

“不要告诉他们，”她说。这就是全部：不要告诉他们。

她的眼睛，如水一般的黑暗中的一个斑点，紧盯着我的脸。然后我们哭起来：她的眼泪裹挟着我。为了互相安慰，我们的手握到一起，交叠着，像小女孩们一样，以一种困惑的方式，在秘密的理解

与无言的忠诚中，我父亲生命中那些粘性的物质将我们像姐妹一样连接到一起。在外面，我们的凯尔皮犬^①刨着纱门，呜咽着，哀求着要进门来。玛丽和我没有理它。在这一刻，事物的尺度与意义顽固而执拗地，是“人”。

*

如何安静而体面地将所有那些早已离散的东西聚拢？如何令死者复活——倘若他们毕竟是人，而不是符号，不是我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的功能，也不是根据我的意图修剪而成的轻薄的皮影人偶？

我的父母结婚两年后生下了我，当时母亲三十八岁，父亲三十六岁。他们都没有计划要孩子，实际上，他们都习惯于自我封闭，安然于维持他们伴侣关系的种种孤独。我是一个错误，一个有点令人困惑的干扰，打从童稚之初，我就明了这种悲哀的地位。完全可以预期的是，他们待我如一个小不点的成人，为我安排了行为的强化训练，坚持戒律与压制，和我说话时总是一副严苛的、学究式的腔调。他们都不认为有必要表达情感，或为我们之间的纽带提供任何身体的证明。结果，我成了一个好哀求的孩子，性情乖戾，缺乏安全感，渴求他们的赞许，但又故意断然地以我知道会考验他们、会令他们生气的方式行事。在我们之间的战争中，有的只是失

^① 凯尔皮犬(Kelpie)，一种原产澳大利亚的畜牧与守卫犬，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工作犬，毛色常见红色、深褐色、黑色、金色、蓝色、黑色混黄褐色等六种。“Kelpie”这个词来源于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芬森的作品《绑架》。

败。如果没有那个抚养我长大的土著女人,我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些事儿,比如:靠着乳房躺着,像对待礼物一样感觉皮肤,在脖子下面触摸脉搏缓缓的跳动,以亲密和甜蜜的亲近去聆听在一个休憩的身体中进出的空气。

我生于1930年,童年在战争中度过。我的父亲在一战中曾作为一个年轻的上尉服役,带着深陷于背部的榴霰弹碎片回家,因此走路时有点跛,步态笨拙,身子歪斜。他对因病退役感到非常恼恨——对于自己的残疾他有一种模糊的耻辱感——战争再次降临时,他被拒绝服役,这令他感到双重的羞辱。他逐渐变得顽固、自私,但仍然渴望证明他的男性气概。到1928年,他的眼神已经变得和那些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一样疲倦困乏,他和我的母亲结了婚——我想,这是作为某种模糊的,甚至是无法命名的补偿。那肯定不是爱;爱,会令其自身显明。爱,是一种可触可感的温柔。那是一个对抗失败的声明,是某种形式的获取。

他俩相遇于父亲在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的最后一年,那时,母亲所从事的工作是当年还为人熟知的“伴女”^①。我的父亲,尼古拉斯·基涅不愁钱花,他的父亲在伦敦有四家男子服饰用品店,正想让他去打理。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能保障一份独立的年收入。但是,橱窗中陈列着人体模特的景象令尼古拉斯充满恐惧。他无

① 伴女(lady's companion):一个出身良好的妇女为有钱有地位的女人提供收费的陪护,陪雇主外出,与其聊天,帮助其招待客人、出席社交场合。这种工作在英国出现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逐渐消失。伴女的地位并不等同于女佣,通常只有其出身与雇主地位相当或略低一点的妇女才有资格充当伴女。

法告诉任何人,为什么他感觉自己会被父亲给予的生活诓骗,为什么,在凝视那些他最终将会继承的店铺橱窗时,他感到一种病态惊恐的隐约战栗。悬挂在无生命的身體上的外衣唤起他战争的記憶。在他面前,再次浮现出 1918 年那恐怖的杀戮,那些裹在烂泥里的人们的毁灭,被死亡弄脏的卡其布,躺倒断了气的人们。他对自己的存活感到惊讶,这令他自以为不同寻常,是上帝的一个选民,一个生还者,一个幸运的人——即使当他被爆炸从身后推倒,发现自己的背部被撕开。他不能站在柜台后面,他受不了那些有着身体形状的衣服、耷拉在衣架上的袖子,受不了任何衬衣松松垮垮地套在半身像上。一种他不肯承认的痛苦令他经常想起:被炸往天国的身体,尸体的腐殖土。他会耗尽生命来协调一个危险的矛盾——既想要记得,又想要忘记战争。

在剑桥的国王学院对面的一个阴暗的小茶馆里,尼古拉斯遇见了我的母亲斯特拉。那是一个呵气成冰的冬日,他侧着身子寻找暖和的隔间,从一个客人身边挤过时自己的盘子被掀翻,泼到了在他左边坐着的客人身上。我的母亲叫出声,跳将起来,手臂激动地挥舞着,要将滚烫的液体拂开。父亲一边道歉,一边俯身帮她拍打。污渍在她大腿上蔓延开来,那是她晚些时候还记得的:她将会向自己最要好的姐妹玛格丽特描述,这多么令人震惊,显示出多么含蓄的性意味。尼古拉斯和斯特拉坐到了一起,彼此都不太自在,但却互相感激,并且意识到一种刚刚出现的、纤细的吸引力。

尼古拉斯在斯特拉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倘若他追求她,她不会说“不”;只要他献殷勤,她就会被取悦。斯特拉在

尼古拉斯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模糊的毁损的标志,从他进入茶馆时走路的方式——门上的小铃铛让她在每进来一个客人时都会抬头观望——她立刻猜出他在战场上受过伤,害羞而脆弱。她想,只要答应和他一块儿出去走走,他就会被取悦。在这种钟摆式的互相打量中,两个人以某种方式交汇,几乎未经讨论就同意第二天在这家茶馆见面。

这不是一场热情的求爱,也不是一种热烈的追逐,那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洒开来的污渍被放大了。说到底,倘若这里有任何浪漫的庄严,那也只是存在于国王学院那隐约显现的建筑正面,它们在冬日的光线中呈紫红色,宏伟,严峻。在他俩蹑高跷般僵硬虚饰的谈话过程中,斯特拉不时神经质地对那建筑扫上一眼。

第二次见面时,她戴上了自己最好的帽子,一顶灰色毡子的钟形女帽,装饰着一只孔雀羽毛的眼睛。但她意识到,尼古拉斯似乎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顶帽子。他是一个对于世界之细节无动于衷的人:他从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中得到的,只是抽象。不会有表达爱抚的动作,也不会有温柔的手势,没有爱的便条,也没有花,没有对她的外貌的品评。往来之间,他俩都采取了向对方妥协的态度。他俩将以正常婚姻的形式走到一起,使各自的下半辈子有个归属。

从军队退伍后,尼古拉斯在英格兰银行当了好几年职员,直到他发现这工作难以忍受,于是决定重返大学,继续他在很久以前被战争打断的学业。但是,在攻读法律才几个月之后,他便把自己的专业改成了人类学。这个学科有着古怪的庄严感,以某种方式源

于它是一个未完成的学科,以及在其前沿领域中所遭遇的挑战性诱惑。

他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决心去揭示他乐意称之为“元素的人”的秘密。他关于人类发展与文化差异的理论有着殖民帝国式的傲慢。他认为那些生活在部落中的人们卑贱、愚蠢,和小孩差不多。但他也认为,在他们的行为和信仰中保持着性、侵犯与身份的起源。他信仰大英帝国,相信它有权进行统治。他后来在西澳大利亚时写下的几篇论文也表明,他相信神话的普遍性。相比宏大的设计,特异性较少激发他的兴趣。

在玛格丽特看来,斯特拉·格兰特曾经是一个有趣的孩子。她是三姐妹中最大的一个(老三是伊瑞斯),她很早就对莎士比亚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迷恋。她的父亲是个面包师,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她的教育和家庭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预示这种文学上的痴迷。

她在记忆中保留着一小部分精选的戏剧,还有差不多五十首十四行诗;她在莎士比亚的语言中发现了铺张与精细,一种充满预示性的荣光,那是她自己过于平凡的生活所缺乏的。

斯特拉热爱那个充斥着谣言的宇宙,人们嘴里说出的是押韵双行诗、令人迷醉的句子或者鲁莽大胆的表达。除开这些故事本身——照例,都必定是些要命的或有魔力的爱情——那里有的是张扬卖弄的语言,狂暴剧烈的无节制。这些东西,如此之多地存在于被高声朗诵的他人的欲望和命运中,存在于言语可能形成和表达之事物的宏大中。而在她的生活里,如此之多的东西却被隐藏

或沉默着。“把奶油递过来”是餐桌上唯一的声音(因为她的父亲相信,孩子应该处在大人视线中,但不能出声),统治着这种生活的是抱怨、厌烦和对家务之整饬有序的单调乏味的关注。在这种生活中,莎士比亚的世界全然是她自己的,为她覆上私密的满足。此外,尽管斯特拉并不像哈姆雷特一样相信“结局还总归是神来安排”^①,但她仍然羡慕他对痛苦的质疑,并将其化为己有。

晚上熄灯后,她躺在床上,轻声背诵。玛格丽特记得,那是将她和伊瑞斯送入梦乡的圣歌。她还记得,姐姐那些嘶嘶作响的私语,还有那些她至今仍无法理解的令人困惑的词句与想法。玛格丽特会说,到如今,姐姐的声音仍然会偶尔回到她耳边——只在黑暗中快要睡着的那一刻回来。只在黑暗中,我的姐姐,斯特拉。

离开学校后,斯特拉在一家糖果店工作了一段时间,整日包裹在糖的香味中,直到最后觉得厌恶而腻味。她服务的对象是脏兮兮的小鬼们,还有那些溺爱孩子的妈妈,每次倒出一个模子的牛眼糖或者扭紧一个纸袋子,她都会感到屈辱。她憎恨自己无意义的生活,这生活的标记,是价值几分几毫、有着俗丽条纹的被煮沸的糖汁,是钱包开合的咔嗒声,是对用作零钱的小小铜子儿的计算,是日复一日、令人狂怒的屈尊俯就。

斯特拉打听到有个“伴女”的职位,并发现那份工作的职责中包括高声朗诵。她觉得这会是一个她能够更好忍受的新牢笼。雇她的那位女士,惠提库姆夫人,因为一战而变成寡妇,她碰巧不需

^① 语出《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

要太多的陪护。斯特拉每天至少有一半空闲。随着时间推移，她发展出一种心不在焉的被动，一种安逸、恍惚、梦一般的虚浮状态。她不再把自己的生活看作单单独独的一桩事儿，直到有一天，她如梦初醒地发现自己已经做了几乎二十年的“伴女”，而在她身前的那位女士也过了八十岁，早已是风烛残年。

当她在茶馆里遇到尼古拉斯·基涅时，她看到了自己的出路。“泼茶”事件过去三个星期后，惠提库姆夫人恰到好处地死了。她的遗嘱中没给斯特拉留下任何东西。尽管斯特拉为她服务了这么多年，但这似乎仍然说得通；毕竟，斯特拉已经或多或少地停止了她的自己的存在。也因此，就这场婚姻的双方而言，都得到了一个便利，尽管他们还没有提及澳大利亚，甚至一次都没有说过。而她将永远也不会原谅尼古拉斯，因为他没有跟她商量就做出决定，将她拖到这个地球上神秘的另一边去了。

他们的婚礼在婚姻登记所进行，尼古拉斯的父亲哭了。他摘下眼镜，擦拭眼角，搞得那群宾客大为尴尬。他有过三个儿子，尼古拉斯是唯一还活着的，而他最后能够想象的是：孙子孙女，他的姓氏的延续，“基涅众子孙”的金字招牌赢得永恒。斯特拉的父母也在场，还有她的妹妹们，玛格丽特的丈夫、女儿和两个儿子。玛格丽特说，尼古拉斯一次也没有搂过斯特拉的腰，这对新人从头到尾都显得三心二意。

斯特拉披着婚纱，领口上钉满紫罗兰。她的手神经质地动个不停，似乎心事重重。老基涅先生在当地的酒店里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烤猪肉、啤酒，随后还有一份芳香馥郁的李子蛋糕；但是

家里人都判定,他是唯一从头到尾自得其乐的人。

那天天色灰暗、阴沉,好像要下雨的样子。婚礼上没有跳舞,尼古拉斯喝得大醉。在那些实用的结婚礼物(茶壶、平底锅、瑞士钟、一套爱尔兰亚麻布织物)中有一条西班牙披肩,整齐地折叠着。这条黑色披肩是玛格丽特从卡迪兹^①订购的,带着长长的流苏,绣着罂粟红的环状图案。对于斯特拉来说,这成了她所有失去的梦想、她生活中所有非莎士比亚的东西的悲哀的象征。

这条西班牙披肩是母亲的衣物中我仍然拥有的唯一一件。穿上它,我就会想起她,在所有这些流逝的岁月之前,一个崭新的新娘,向前凝望着模糊的不可知的未来,这未来还没有被我父亲的拥抱改变,依然是不确定的。我将自己裹到这披肩里,想象这是她未宣之于口的疑惧,是她的宿命论的感觉,是她的坚实的观点。触摸这披肩,令我感到安慰。它柔软,像记忆一样裹得紧紧的。到如今,经过一生的岁月,这条披肩带回斯特拉肩膀的形状与她头部的特殊倾斜度。从时间那向后回溯的幽暗深渊中,下巴的轻轻一抬,还有逆光的轮廓。

*

在我十岁时,父亲死了,后来我就开始结巴。在那之前,我和任何孩子一样口齿伶俐,是一个饶舌的家伙,实际上是一个无忧无虑、自鸣得意的话痨。但是,我突然开始在发声之前看到我要说的那些词语,它们抢在我前面出现,犹如幻觉。看见要说的东西,这

^① 卡迪兹(Cadiz),西班牙西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

令说变得不可能。在我口中,音节坼裂、破碎,舌头变成一个沉重、顽抗的玩意儿,词句分离、蹒跚、黏滞。我发现,如果我用低语的方式,说话就会变得容易些,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会偶尔看到那些词句无声地集聚,它们会在我的脑袋里翻滚,像雾又像水,然后就像拔掉了塞子一样,爆发式地脱口而出。

因为这种折磨,我说话越来越少。我开始默不出声地阅读,逐渐发现书上的词句在我的头脑中嬉闹,保持着它们节奏上的完整。其他人开始认为我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小孩,或者将我的沉默误认为是悲伤,因而感到轻微的同情。我的母亲绝望了。她生活在异国他乡,没有回家的盘缠。那么,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是一个孤独的寡妇,还带着个顽固、愚笨的小累赘。她狂暴易怒,破口大骂。她告诉我,要我振作起来。但是,我已经以某种方式——至少是在语言中——崩塌下去了。直到那时,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这般被词句构筑。我从不知道,一个孩子可以被这样根本性地重塑。

*

尼古拉斯选择澳大利亚来做他的田野工作,因为它吸引了他对疯狂的感觉:哪个有头脑的英国人会主动去澳大利亚?那肯定是一块黑暗的大陆,充斥着难以驾驭的神秘。也许尼古拉斯也想要惩罚他苍白、乏味的妻子,把她从姐妹们身边拖走,令她更加依赖他。婚姻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挫败与遗憾早已是其面目的一部分。尼古拉斯不知道,他将在这儿待上十年,并且会在四十六岁上死在这里,死在他自己的一汪尚还温热的血里,鼻孔里嗅着泥垢,听着苍蝇在荒漠的风里盘旋,在他临终之时想着一切,想着任

何想说的东西——但却绝不会是英国。

尼古拉斯和斯特拉 1930 年到达澳大利亚时,这个国家陌生而难以辨识。当时正逢经济萧条,社会上弥漫着对共产党的恐惧,西部的分离主义运动正兴起。这里有平庸低劣、假作高雅的精英,开金矿的百万富翁,穷困的劳工,还有一种孤立主义的姿态。对许多人来说,人类学肯定是一种完全无用的职业。

尼古拉斯在珀斯^①和土著护民官^②见面,被告知他的田野工作计划有助于对当地人的管理。当地土著容易受到共产主义者和外国人的误导,也有可能被那些神神道道的传教士鼓动起来暴乱。他们需要被看管,被评估。护民官说,他们曾经“骚乱”,并造成人员伤亡。很显然,某些事情秘而不宣,某些事情不宜提及。尼古拉斯并未去探询他话里的意思,感到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有了确信,知道自己将会向政府机构交上报告。

在珀斯,尼古拉斯和斯特拉登上一艘商船,朝西海岸行去。尼古拉斯大模大样地挥舞着手头的政府批文,船员们怀疑地打量着他,嘲笑他傲慢的腔调。尼古拉斯看着他们闲聊,看他们抽手卷的香烟,他们有着嘲弄而自信的集体态度;他们赌咒发誓,开着粗野的玩笑;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他试图加入但被拒之门外。他无法忍受退缩到那个有幽闭恐惧之感的小舱室中——斯特拉在里面

① 珀斯(Perth),澳大利亚西南一城市,濒临印度洋。建于 1829 年,19 世纪 90 年代在此发现了金矿之后迅速发展起来。

② 土著护民官(Chief Protector of Aborigines),1838 年开始英国政府在澳大利亚设置的管理和保护原住民权益的职务,由英国人担任,到 1970 年代该职位取消。